

北平解放的号角从这里吹响



和谈序曲:

军事压力政治争取双管齐下
早在勾勒平津战役的战略构想时,中国共产党就把争取傅作义率部起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分几条线做傅的工作。
在此之前,共产党已经在傅作义的身边留下“棋子”。1946年的一天,化名张治公的王玉堂党中央委派,找到了跟党组织失去联系7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阎又文。
此时的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的职务和地位已经很高,除任傅作义的秘书外,还兼任第12战区长官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以及傅部的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阎又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不为小的局部战场情报而暴露,潜移默化地对傅作义施以政治影响。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态势。中共中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对傅作义在武力斗争的准备下,积极进行政治争取。
1948年10月上旬一个周日的上午,中共平津南系学委领导派人赶到前门东站,拦下正要上火车返津的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让她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她回到其父身边。

回到北平后,傅冬菊惊奇地发现父亲竟然在读毛主席的著作,还用红蓝笔勾画了重点,于是便经常偷偷将解放区的进步杂志和书刊放在父亲的书桌上。傅作义有时会翻看。
傅作义顾虑重重,对敌多年,共产党真的能接受他吗?若和谈成功,多年来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如何安置?傅冬菊一一汇报给地下党组织,再依据党组织的指示,回来细细劝说傅作义,打消他的疑虑。
地下党学委崔月犁也通过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等人一起做傅作义的工作。
11月底,东北野战军源源不断进驻北平周围,傅作义在办公室如坐针毡,思想情绪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12月初,东野和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住了傅作义部南逃、西窜的通路。
傅作义感到了和谈的迫切,于是授意李鹏九与共产党联系。学委决定派李炳泉与傅作义秘密接触。
1948年12月10日,李炳泉被傅作义请进了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当得知李炳泉曾在《光明日报》任职时,傅作义很是吃惊:原来共产党人就在自己的报社呀!
这次见面中,傅作义终于下定了谈判的决心,请《光明日报》社长崔毅之作为自己的代表,由李炳泉和崔毅之等人再次进行和谈。北平和谈的桥梁悄然搭建起来。

第一次和谈:
傅作义派代表秘密出城
1948年12月13日,李炳泉带着崔毅之等4人秘密出城。不料出城不远,就被傅作义巡查部队拦截,崔毅之携带的电台被发现,其中缘由不便直说,他们一行人只好原路返回。
12月15日,李炳泉和崔毅之等人再次秘密出城,崔毅之放弃了电台,这才一路搭汽车、三轮车和步行,终于到达了解放军前沿阵

地。可是他们又没与城工部来接头的人碰上,李炳泉只好请求路过的部队将他们当作“俘虏”送往司令部。
对于这次谈判,解放军方面也是严格保密。一封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电报中写道:“贺、陈、杨、何:(一)盼你们派兵将傅作义之代表经北平以北到达三河与我们谈判,(二)望注意勿向部队泄露此事,以免松懈战斗准备,护送部队沿途须严守秘密,护送的指战员皆不应知道此事,以免发生个别战士逃跑泄露机密。”落款是“林、罗、刘”。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与崔毅之开始正式谈判,双方交换意见后因条件差距很大,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谈判结果,中共中央早有预料。16日16时,军委给林、罗、刘的电报中就指出,“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第二次和谈:
双方草签会议纪要
果如中共中央所料,时隔半月,傅作义第二次派出了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少将民事处处长周北峰。周北峰是傅的同乡,曾多次代表傅与中共进行接触。同行的是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由于受到双方的信任,他作为和谈的第三方代表居中调停。
两次谈判期间,华北战场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2月22日,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部队第35军在新保安地区被歼,23日,张家口守军被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战断绝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也给他以巨大的精神打击。
1949年元旦,毛泽东电示林彪平津和谈六条意见,提出了我方的原则立场和政策,表明了我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诚意,还提到,将傅列为战犯,他可借此做文章,和平解放北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这无异于是给了傅作义一副对症的良方。

李炳泉授命背下了450字的六条意见,回北平向傅作义转述,傅作义听后如释重负,情绪大有好转。
中共提出改编国民党军的方案,对傅作义等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双方草签会议纪要,约定1月14日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期限。
傅作义此时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谈判期间仍继续修建天坛,东单两处临时机场,城内地下党同志及时提供情报,解放军用炮火封锁了机场。
第三次和谈:
不谈天津只谈北平
1949年1月12日清晨,一队解放军来到通县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庄——五里桥村(后划归朝阳区),他们对村里张家大院室内外陈设重新进行了布置,还从“东兴居”饭庄请来了厨师。顿时,小村子热闹起来。人

们议论纷纷,猜想着这里可能要来大人物!由于干部严守秘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人们才知道,当时来这里的竟是共产党和傅作义的代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就是在这里达成的。原来,平津前线司令部移到了通县宋庄,所以第三次谈判地点转移到了五里桥。
1月14日午后,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携民事处处长周北峰等一行4人,出城来到五里桥张家大院。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到门口迎接。
解放军在同一天开始强攻天津,敲山震虎。
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全歼天津国民党军13万人。天津被攻克后,北平成了一座孤城,20多万守敌完全处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中,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1月19日,双方代表根据在五里桥签订的协议,逐条具体化,并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修改后,作为正式协议。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毅之分别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22日,傅作义在协议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正式对外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款。

和谈后续:
不扰群众过年推迟两日入城
解放军原本计划1949年1月29日进入北平接收,但考虑到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上午10时起,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虽然天寒地冻,但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北平的市民手执旗帜,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进城。
入城后,第41军干部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隆冬时节,四面透风的城楼上,屋里没有生火,铺上没有干草,北风吹得“透心凉”。附近百姓多次请战士们到家里烤火取暖,但战士们坚持不进民房,不打扰群众。121师“长岭连”刚到驻地当晚,热情的老乡请战士们进屋,东单两处临时机场,城内地下党同志及时提供情报,解放军用炮火封锁了机场。

“北平方式”成为各个战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1949年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这一方式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源自人民网)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塔碑文敬读

在江西省南昌市中心八一广场,巍然矗立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纪念馆由塔基、塔座、塔身、塔顶四部分组成。承托纪念馆的台基分三层,均为正方形平面。塔座也分为三层,第一层面积16平方米,高5米,正面(北面)嵌刻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碑文的磨光碑石,高2.4米,宽9.6米。在塔座的东、西、南三面各有一幅大型花岗石人物浮雕。第二层塔座高3.5米,正面有凸起的碑石,刻有“1927.8.1”字样。
塔身高20米,正面镶嵌着叶剑英手书“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9个鎏金大字。塔顶由一高14米的直立“汉阳造”步枪和高8.5米、宽8.1米的用枣红色磨光花岗石做的八一军旗组成,形象地表现了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人民军队从此光荣诞生这一伟大主题。纪念馆占地1.7万平方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四周月季、金边瑞香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塔碑文如下:

碑文语言简洁,文风朴实,概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和伟大意义,阐明了“永志纪念”的建塔目的,读来深受教育,启迪良多。
曙光初现惊雷
1921年7月,古老的神州大地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国共两党在1924年初第一次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动北伐战争。北伐军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不到一年,迅速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中国大地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大革命风暴,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正当北伐军奋勇前进,工农运动汹涌澎湃,暗夜初现曙光之际,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举起屠刀,背叛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随后,蒋汪合流,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石破天惊第一枪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等在九江会议上提议发动南昌起义,报中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南昌,当晚,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起义时间定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后由于第20军的一个副营长投敌叛变,提前到凌晨2点进行。起义军司令为“河山统一”,颈系红领巾,膀扎白毛巾,马灯、手电筒贴红十字作为识别标志。

7月31日晚,朱德利用在滇军中的影响,宴请敌两个主力团长和团副,使其脱离指挥位置,削弱了敌人的指挥力量,有力地配合了起义战斗。
8月1日凌晨2点,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全城内外响起一片激烈的枪声。经过4个小时激战,起义军在黎明时分占领了南昌城。
8月2日,南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庆祝起义战斗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工人、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南昌市民纷纷以各种方式慰劳起义军。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向广东进发。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八七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党在付出大量血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给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纪念南昌起义,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规定,每年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军旗、军徽上以“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源自人民网)

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赵金和非常兴奋。他把木匣子的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赵玉琳。在他心里,这就是最珍贵的“传家宝”,要让儿子也知道红军队伍的好,把“传家宝”传下去。
当赵玉琳打开木匣子,看到条子上写着的“我军走后转来再用”字样时,心里忍不住嘀咕,收条和这些苏维埃币已经留下17年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转来再用”,进行兑现呢?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到遵义市凉水乡公所,找凉水乡民政村村长刘子良开了一张介绍信,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桃溪办事处咨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当即兑换了35000元人民币。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这张收条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是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文物展出时,这张收条被群众亲切地称作“红军买猪条”。
如今,赵金和的孙子赵元和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工作,传承着红色基因,讲述着“遵义故事”:“红军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还能严守纪律,不贪占群众财物,现在生活这么好,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续写新时代的‘收条故事’,不断砥砺前行,扛牢使命、实干担当,奉献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源自人民网)

一张表面泛黄、残缺不堪却字迹清晰的收条,纵高17.1厘米,横宽12.6厘米,构皮纸,墨笔书写,七行,行书体。这张看似陈旧而普通的纸条,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买猪条”,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收条全文为:“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壹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票壹元。我军走后转来再用,此致,连陈树容,公元一九三五年阳历二月廿号”。

历经80多年岁月的收条,犹如一位历经岁月洗礼而恬静的老人,无声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诉说着当年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伟大转折所蕴藏的“胜利密码”。它是革命队伍纪律严明、严格自律的见证,映照着我们党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的不变初心。
1952年春天,家住贵州遵义市红花湖区凉水乡的赵玉琳起了一个大早。一直以来,父亲赵金和口中的“传家宝”,令他充满好奇。趁着父亲不在家,赵玉琳偷偷地打开“传家宝”——一个木匣子,一张字迹工整清秀的收条呈现在眼前,里面还装着15张苏维埃币。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各地根据地曾经印制发行过多种货币。这些发行的货币,后来被称为苏维埃币,它为中国革命筹集了必需的物资,也为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是革命政权的体现。
泛黄的收条,以及那些珍贵的苏维埃币,随着赵玉琳打开的匣子,开始显于世,把人们的眼光和思绪,拉到那段充满艰辛且难忘的岁月。
1935年1月7日凌晨2点,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初到遵义的红军先头部队,虽衣着破旧,但却精神抖擞、纪律严明,他们不顾严寒,选择在屋檐下、道路旁席地而卧、静静休息,没有人私自闯入群众住宅、店铺,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遵义后,成立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币,在群众中购买生活用品,并设置苏维埃币兑换点,按每天的物价从老百姓手中等价换回苏维埃币。红军不仅买卖公平,而且对苏维埃币进行完全兑现,给当地群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遵义停留期间,无论是采购军需,还是补充物资,红军都按照市场价支付钱币,借用群众的东西也及时归还,损坏群众的东西进行赔偿,甚至在群众家借灶做饭时,都自带炊具、盐、米,并负责挑水、劈柴,打扫卫生,不给主人添一点麻烦。严明的纪律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良好作风,让红军取得了群众信任,赢得了群众称赞。
反动武装的举动,令赵金和一家对红军更加信任,更加怀念。这张珍贵的收条,成为他心里珍贵记忆的寄托,成为与红军情感相牵的物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收条,也不再是普通的收条了,而是“红军纪律严明、红军为群众着想”的物证,化为广大群众对“红军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赵金和非常兴奋。他把木匣子的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赵玉琳。在他心里,这就是最珍贵的“传家宝”,要让儿子也知道红军队伍的好,把“传家宝”传下去。
当赵玉琳打开木匣子,看到条子上写着的“我军走后转来再用”字样时,心里忍不住嘀咕,收条和这些苏维埃币已经留下17年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转来再用”,进行兑现呢?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到遵义市凉水乡公所,找凉水乡民政村村长刘子良开了一张介绍信,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桃溪办事处咨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当即兑换了35000元人民币。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这张收条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是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文物展出时,这张收条被群众亲切地称作“红军买猪条”。
如今,赵金和的孙子赵元和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工作,传承着红色基因,讲述着“遵义故事”:“红军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还能严守纪律,不贪占群众财物,现在生活这么好,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续写新时代的‘收条故事’,不断砥砺前行,扛牢使命、实干担当,奉献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源自人民网)



将这份历史记忆刻在当下留与后人

400余件馆藏档案讲述辽宁抗战故事

9月16日,省档案馆“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辽宁人民抗日斗争档案文献展览”面向社会开放。

展览通过大量珍贵档案史料、图片等再现辽宁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历程,重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革命岁月。
感人的细节 讲述厚重的历史
进入展厅,展览的第一部分就是以档案史料、图片讲述“中国共产党在辽宁建立组织”,历史厚重的画卷,就此徐徐展开:从1921年冬罗章龙到东北筹备建党工作,直到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全东北地区的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从此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讲好红色故事,通过真实感人的细节生动阐释伟大的抗战精神是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据省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展览首次集中展示了4份敌人审讯共产党员张浩、杨一辰、陈潭秋、刘伯刚的笔录,这些笔录从侧面表现出革命者至死不渝的耿耿丹心和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张浩于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去抚顺巡视工作回奉天的途中被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酷刑逼供,毫不畏惧。展览展示的张浩在狱中的受审笔录,字里行间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阅读档案原件,不仅能读到战争年代的硝烟和苦难,更能感受到革命先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气概。
档案史料背后展现家国情怀
主题展览展出的档案史料非常丰富,图文并茂,其中40余件档案原件为首次对外公布。
展览中的一张老照片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沈阳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的史实。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共产党员在抗议五卅惨案示威游行后决定退学。这张照片就是学生在离校前的合影。

另一张老照片展示的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奉天北市场福安里4号,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170号。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使全东北地区党的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从此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是黑白照片,却把当时的场景呈现得清晰明了。
一份档案资料的背后就是一份爱国情怀,一个名字的背后就是一个英烈故事。展览通过档案史料展现的生动细节,细腻情感令人动容。
(源自人民网)



留存90多年的记忆
1917
十万华工的战争

一张收条鉴初心



一张表面泛黄、残缺不堪却字迹清晰的收条,纵高17.1厘米,横宽12.6厘米,构皮纸,墨笔书写,七行,行书体。这张看似陈旧而普通的纸条,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买猪条”,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收条全文为:“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壹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票壹元。我军走后转来再用,此致,连陈树容,公元一九三五年阳历二月廿号”。

历经80多年岁月的收条,犹如一位历经岁月洗礼而恬静的老人,无声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诉说着当年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伟大转折所蕴藏的“胜利密码”。它是革命队伍纪律严明、严格自律的见证,映照着我们党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的不变初心。
1952年春天,家住贵州遵义市红花湖区凉水乡的赵玉琳起了一个大早。一直以来,父亲赵金和口中的“传家宝”,令他充满好奇。趁着父亲不在家,赵玉琳偷偷地打开“传家宝”——一个木匣子,一张字迹工整清秀的收条呈现在眼前,里面还装着15张苏维埃币。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各地根据地曾经印制发行过多种货币。这些发行的货币,后来被称为苏维埃币,它为中国革命筹集了必需的物资,也为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是革命政权的体现。
泛黄的收条,以及那些珍贵的苏维埃币,随着赵玉琳打开的匣子,开始显于世,把人们的眼光和思绪,拉到那段充满艰辛且难忘的岁月。
1935年1月7日凌晨2点,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初到遵义的红军先头部队,虽衣着破旧,但却精神抖擞、纪律严明,他们不顾严寒,选择在屋檐下、道路旁席地而卧、静静休息,没有人私自闯入群众住宅、店铺,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遵义后,成立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币,在群众中购买生活用品,并设置苏维埃币兑换点,按每天的物价从老百姓手中等价换回苏维埃币。红军不仅买卖公平,而且对苏维埃币进行完全兑现,给当地群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遵义停留期间,无论是采购军需,还是补充物资,红军都按照市场价支付钱币,借用群众的东西也及时归还,损坏群众的东西进行赔偿,甚至在群众家借灶做饭时,都自带炊具、盐、米,并负责挑水、劈柴,打扫卫生,不给主人添一点麻烦。严明的纪律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良好作风,让红军取得了群众信任,赢得了群众称赞。
反动武装的举动,令赵金和一家对红军更加信任,更加怀念。这张珍贵的收条,成为他心里珍贵记忆的寄托,成为与红军情感相牵的物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收条,也不再是普通的收条了,而是“红军纪律严明、红军为群众着想”的物证,化为广大群众对“红军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赵金和非常兴奋。他把木匣子的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赵玉琳。在他心里,这就是最珍贵的“传家宝”,要让儿子也知道红军队伍的好,把“传家宝”传下去。
当赵玉琳打开木匣子,看到条子上写着的“我军走后转来再用”字样时,心里忍不住嘀咕,收条和这些苏维埃币已经留下17年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转来再用”,进行兑现呢?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到遵义市凉水乡公所,找凉水乡民政村村长刘子良开了一张介绍信,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桃溪办事处咨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当即兑换了35000元人民币。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这张收条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是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文物展出时,这张收条被群众亲切地称作“红军买猪条”。
如今,赵金和的孙子赵元和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工作,传承着红色基因,讲述着“遵义故事”:“红军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还能严守纪律,不贪占群众财物,现在生活这么好,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续写新时代的‘收条故事’,不断砥砺前行,扛牢使命、实干担当,奉献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源自人民网)